

破折号与德里达式的“不可译之译”

——以康拉德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三个中译本为例

涂险峰 蔡 玮

【摘要】德里达式解构翻译理论强调“不可译性”，而解构理论对于二元对立的消解也意味着“不可译/可译”之二元论模式的消解。“不可译性”既是文学翻译的基本属性，也是评价译文是否忠实于原文的“不是标准的标准”。破折号之类的书写记号典型地传达了语音缺席的隐秘性及“不可译”特征，但“不可译性”恰恰召唤特定语境下冒险翻译的“经济学”度量，使得翻译可能。由康拉德小说《在西方的注视下》三个中译本对待破折号的不同处理态度切入，可以看出翻译主体介入书写秘密的不同状况，从而揭示书写记号与“不可译性”之关联，文学翻译忠实于“不可译性”之必要，以及德里达式“不可译之译”的可行性。

【关键词】《在西方的注视下》；康拉德；解构翻译；“不可译性”

【作者简介】涂险峰(1968-)，男，湖北石首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蔡玮(1982-)，女，浙江台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1.2.67~75

一、康拉德与德里达的“巴别塔”之遇

《在西方的注视下》(*Under Western Eyes*)^①(以下简称UWE)是康拉德创作高峰期的重要小说。其主人公拉祖莫夫被迫卷入一场他一直试图置身局外的政治斗争，并因害怕殃及自身而向俄国独裁政府出卖前来避难的革命者哈尔丁，后又被政府指派为间谍潜入革命组织内部并与哈尔丁的妹妹相爱。在革命组织成员几乎消除了对他的所有戒备之后，他却坦白身份，经由忏悔走向毁灭，或曰新生。康拉德在信中介绍说，小说的真正主题是拉祖莫夫背叛哈尔丁以及坦白事实真相的整个心理发展过程^②，研究者们则注意到，小说的另一要旨是“对语言本身的怀疑”^③，或认为“丧失听觉的纯粹性是这部小说的核心主题”^④。

康拉德是一个以波兰语为母语且处于多语杂糅文化背景中的英语作家。由“语言引起的创作困境和理解困难”是其创作UWE时期关注的焦点，他发

现自己的书写天赋未能缩小言说和语言之间的距离。^⑤如果说UWE同样也揭示了人类听觉等感知的非直接性，那么主人公拉祖莫夫在走出谎言牢笼，坦白自身罪行之后，被暴徒击破耳膜，失去听觉，便是以成为一个聋人的代价来反抗他已然意识到的人类处境——除陌生于人类激情的自然天籁之外，“尘世间所有其他那些声音都给灵魂的清静带来污染”^⑥。如同解构主义批评大师德里达致力于质疑“声音霸权”的传统，小说也质疑了这种遮蔽自身杂质的“声音的暴力”，揭示了人类感知能力和语言的局限以及对这种局限性的遗忘与回忆，这使得小说同时也是关于阐释和沟通的小说，甚至是，关于翻译的小说。

德里达的批评理论，以解构苏格拉底以降直至海德格尔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传统而著称。根据这种“声音霸权”的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和经验是纯粹的所指(signified)，语音是其能

指(signifier),书写则是语音之能指;语音是与思维主体共时的第一位载体,而书写则成为远离意义的附属载体,或能指之能指;语音较之文字更接近原意,乃至“倾听内在声音”几乎等同于“思维”本身。德里达的解构批评则意在消解这种以声音为主、书写为次的传统,而以基于书写的“文迹学”^⑦(Grammatology)取代以声音为中心的“语言学”(linguistics)^⑧。就翻译而言,解构理论也意味着视野和路径的根本转换。在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中,翻译以最大限度地捕捉作为纯粹所指的“作者本义”为宗旨,而书写形式则作为与意义相隔两层的次要能指在翻译中备受忽略。但重视书写的德里达却对阅读作品与倾听言说的迥然之别独具只眼。他注意到,阅读时,一方面作者总是不在场,另一方面却又以文本的形式时刻在场。文本意味着作者主体性的缺席,蕴含着无所不在的异己性或“他者”性质,永远无法自足圆满。所以,翻译则更可以看做对内含不可化约之“踪迹”(traces)的书写文本的“延异”(différance)^⑨活动。德里达的翻译观念强调“不可译性”,翻译与其叫做翻译(translation),不如叫做转化(transformation)^⑩。但另一方面,由于其解构批评的拿手好戏是消解既有的二元对立,如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可感知/可理解(sensible/intelligible)、书写/言说(writing/speech)、言语/语言(speech/language)、历时性/共时性(diachrony/synchrony)、空间/时间(space/time)、被动性/主动性(passivity/activity)等概念^⑪均不例外,所以,如果将其解构逻辑继续下去,则“可译性/不可译性”这种看似二元对立的消解,似乎也成题中应有之义。而在笔者看来,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始终会以悖反折叠(异质的差异共在而非辩证调和)的方式存在于德里达式的解构翻译之中。

德里达在《巴别塔》中曾指出,“巴别”(Babel)专名(父之名或上帝之名)的破碎导致的“混乱”是语言的来源、习语多元体的来源,即被称做母语的东西的来源,^⑫这也意味着语言的规范秩序和整体把握的

不可能性。铭写入习语的意义不再如形而上学所要求的那样理想、纯粹和透明,时间洪流中的语言无法直接把握当下感知,直涉所指。现象学所基于其上的“活生生的当下”已然是“踪迹”,是一种原初书写。“巴别”导致的分散就是解构,解构就是“父之名”的不可能性(不可译性)。一方面,它揭示出被遮蔽的各习语沟通所存在的无法弥补的空隙和无法全然占据的剩余,那片寂静无声却布满踪影的荒凉地带;另一方面,“父之名”又请求翻译,请求神圣信息的传递。这样,翻译的任务就“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⑬

而康拉德亦曾提及的先于理智把握的书写任务——“通过书写文字的力量让你听到、感觉到——首先是,使你看到”^⑭,表达了相似的先于认知秩序,并使得感知和语言得以可能的书写的力量。正因为书写的结构中包含缺席,包含语言无法指涉的外在之物,包含他者之踪迹,其绝对透明的理想阐释和翻译就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试图抵达的即时性真实总是已然离去,如同UWE中死去的哈尔丁,只能以幽灵的形态存在于生者的记忆之中,并且抵制着内在记忆的关闭,向着未来新语境中的记忆更替而无限打开。

除了在真实与谎言之间游走的拉祖莫夫因为心灵的撕扯而语言常常破碎凝滞之外,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似乎都承受着对现实的错误再现所带来的不幸后果和无法正确表述的语言困境,因此“相当程度上,这是一本意义从语言转移到姿势(gesture)中的小说”^⑮,转移至语言无法到场时身体的痛苦表露之中——双手紧攥或无奈低垂,嘴角抽搐颤动或失神落魄自言自语发出奇怪的愤怒声响。姿势,一种德里达意义上的“书写”记号——先于语言并使语言得以可能的“前语言事件”^⑯;姿势,也是定格在拉祖莫夫意识深处的哈尔丁最后那个身影:“高挑挺拔像一支箭,脸色苍白,一只手专注地抬起,作兴是为塑像摆了个姿势,表示勇敢的青年倾听内心的声音。”^⑰听

从心里爱的召唤,真实的召唤,无声的姿势因此就是无法被规则或概念框定的真实和意义本身,就是语言对事件的“述-行”(performative)替补,诗意语言的创造。

康拉德在给加内特的信中写道:“有些东西给人留下印象——产生了效果。什么东西?无非是表达——语词的排列组合,风格。”^⑧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指出“可译性是一定作品的根本特质,……意味着内在于原作中的某些特殊的意义在可译性中自行显现。”^⑨并且,可译性决定了原作的层次也决定了原作是否值得翻译,召唤翻译。“一部作品的层次越高,它就越具有可译性,即使它的意义稍纵即逝。”^⑩因此,在本雅明看来,翻译不是传递信息内容,亦非再现某种形式效果,而是搭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内在亲缘关系,是著作生命的谱系运动。然而德里达却将本雅明服务于语言的翻译移置到服务于书写上,将本雅明的“可译性”概念改造成“不可译性”,而书写的“不可译-可译”(欲求着理解的不可理解)是连接作品语言风格与内在意蕴的相关要素。翻译中若破坏了这种相关性,就破坏了原著的艺术生命。因为译作同时是原作的“再生生命”(Überleben)与“后续生命”(Fortleben)。生命与维持生命的关系,是原作内在结构的形式法则。原文是第一个负债者,请求签名者,它从一开始就因缺乏和有限而请求翻译,请求生命的持存。

解构翻译理论的诸要求因此也是UWE这部小说对自身生命的可重复性、可持续性的要求,它要求对小说中不在场之物的秘密性的忠诚,要求具体情境中临时规则的创造,要求放弃对作者意图的猜测和译者偏见的强加。或者说,主体缺席的必要性,要求以“不可译”的诗性语言的方式、习语或述行语的方式,履行对“不可译”之“可译性”要求说“是”的责任,以译文是否是一种“书写”,是否具有可复现性作为标准来度量翻译是否配得其名,因为书写是连接起译文与原文亲缘关系的血脉。下面,我们从UWE

三个中译本^⑪对待破折号的不同处理态度切入,辨析其对待书写的“秘密”和译者主体介入的不同状况,从而揭示破折号之类的书写符号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联,阐明文学翻译中“忠诚”于“不可译性”的必要性,同时也将说明,解构翻译理论并非脱离实践的抽象话语,以及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形而上学话语与具体实践之不可分离。

二、破折号与“秘密”的守护

踪迹、幽灵或其他者,是别样的秘密的,翻译要求对这种“秘密”的绝对忠诚,而拉祖莫夫正是由于对秘密的出卖和背叛,才陷入痛苦绝望。不妨说,康拉德这部小说,关心的就是“对于一种秘密”的背叛与对死者的记忆,关乎翻译的“哀悼的痛楚”(a travail of mourning)^⑫。如同德里达在《威尼斯商人》那里读出了使得翻译可能的条件——对债务的承认和对不可实现的偿还的承诺,我们也在UWE那里找到关于翻译如何可能的钥匙:姿势。以一个签署名字的姿势唤醒作品中沉睡的死者;一个在述行的(performative)或诗意的书写中的姿势;一个在不可预算的危机中的冒险的“经济学”度量,文本与文本的深渊之上架起的不可能的桥梁。

还有什么标点符号比“破折号”更能标记出这一处于转换之折线上的无地之地(khōra)以及遗留其上的折痕?如同小说的叙述者那双“西方的眼睛”所记录下来:

The more adequate description would be a tumult of thoughts—the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state of his feelings. The thoughts in themselves were not numerous—they were like the thoughts of most human beings, few and simple—but they cannot be reproduced here in all their exclamatory repetitions which went on in an endless and weary turmoil—for the walk was long.(P24)

其中破折号想要补充或强调的,在突显语言不能准确陈述与不能充分表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里的四个破折号既引出了对“tumult”这个词所做的

甚至更为“turmoil”的解说,又仿佛“tumult”所真正指涉的含义被遗落在了一个个小杠杠的间隙里。德里达表明,对语言所做的注解,威胁了词在语义和形式上的统一性,并且打破了作为严格意义上翻译本质的“等量”的翻译经济法则。^④而UWE中到处可见句末破折出一个后缀——渲染,补充,转折或重复——又仿佛意犹未尽时的一个“替补”(supplement)。诸如 He let his arm fall by his side—discouraged(P31), you have now only to persevere—to persevere(P52)这样的破折句俯拾皆是。可以说,一方面,破折句是牵动小说整体意蕴与风格生成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破折号作为一种非声音的书写符号,无论只是起着转折或补充的常规作用还是有着标记性的特殊文体价值,都是置于沉默之下的转换。此处声音的缺席和处于时空之外的未知性使得翻译变得不可能,但在德里达看来,恰恰在这个不可译的纠结难解(aporia)之处,才激发了翻译的欲望,打开了翻译的责任领域。我们来看一下UWE的三个中译本对待破折号的不同翻译策略:

译1:更恰当的描绘是思想的纷乱——其情感状态的忠实反映。那些思想本身并不多——它们像绝大多数人的思想,少而简单——可它们那种翻来覆去的感喟惊叹,在回环复沓而疲惫不堪的心烦意乱中进行,却无法在这儿统统复制出来——因为路程漫长。(许译本第25页)

译2:更恰切的描述应该是一场思绪的暴动——这才如实反映出他当时的心境。就像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单纯有限一样,这些想法本身并不多,但他们没法在这儿被复述出来。因为它们惊人地重复出现,没完没了,乱七八糟。不过也难怪,这段路程走得太长了。(赵译本第24页)

译3:更准确的意象应是“缠绵的思绪”。这才是他情感状态的忠实写照。他的思绪不是漫无头绪。如大多数人一样,它单一而执著,翻来覆去,缠绵不尽,令人惊叹疲惫。在此,我不能忠实再现,因为那

段路很漫长。(李译本第15页)

小说叙事者是一个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语言教师,而对一个判断句子的不断补充解释,一方面体现了叙事者对准确语言、严谨思维和透明表达的追求,另一方面也恰恰暴露了追求的失败,暗示出句子意义的不确定,误读的可能性,以及“tumult”这个词的语义模糊与多元内涵,并且抹除了“thought”与“emotion”的区分界限。经由这番“破碎”和“转折”的注解式说明,最后得出的结论无非是:即便简单的一点思想他也无法再—现(re—present)出来^⑤。再现(represent)和抽象的远距离操作所遗漏或掩盖掉的东西,似乎就藏在所有这些破折号之中,并透露出一个语言教师对语言表征的无力所做的蹩脚的原因辩解——路途漫长。译2、译3对破折号的去除,所损失的就不仅仅是几个标点符号而已,它淡化了整部小说破碎而多层皱褶的语言风格及其突显的“语言之无能”的重要主题。

我们再看一例:

The passers—by were rare.They came upon him suddenly, looming up black in the snowflakes close by, then vanishing all at once—without footfalls.(P26)

译1:路人稀少。他们在近旁的雪花中黑森森浮现出来,与他乍然相遇,便骤然消失——未闻足音。(许译本第27页)

译2:周围行人稀少。在纷飞的雪花里,他们黑幢幢的身影蓦地出现在他身旁,须臾间又消失,连脚步声也没有。(赵译本第26页)

译3:路人很少,偶尔遇到个把人,像团黑影从浓密的雪花中慢慢出现,然后迅疾消失,无声无息。(李译本第16页)

这里的破折号,一方面突显“即时事件”的突然发生与“without footfalls”之间的悖论关系,有着对当下声音之不可驻留与重复之不可能的哀悼性意味,留下来的或许只是对这种再现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标记——“白色”中的黑色印迹,因此少了这个破折号,

这一不可能的哀悼的记忆似乎无处寄放；另一方面，破折号也将场景外氛围和人物内氛围之间的张力拉到极限，其停顿与渐弱的气息形成了轻重缓急的语气与节奏。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说，对破折号的承认和忠诚，关乎对“不可译性”的承认，以及在“不可译性”之“可译要求”下签署名字的承诺，并在履行承诺的责任之中，小心翼翼地权衡度量。如选择“浮现”二字，与“looming up”在质与量的“经济法则”中，在时间的绵延和视觉的模糊性上，建立起最佳的“相关性”，并与破折号一起，最大可能地保留原文场景氛围中的阴森感觉与诡秘气息，为一种(可能的)“形而上质”^⑧让出得以氤氲的空间。

康拉德自己曾表示，“这样将明显的神秘感简单化有时是很难原谅的。”^⑨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不能转移破折号所标记的踪迹物则往往倾向于将复杂神秘之物简约化、僵固化的倾向：

The darkness returned with a single clap of thunder, like a gun fired for a warning of his escape from the prison of lies. (P363)

译1：伴随着一声炸雷，一切又陷入黑暗，像是为他逃离谎言的监狱而鸣枪示警。(许译本第367页)

译2：一声炸雷之后，四周又复归黑暗，这雷声像是示警的枪声，催促他赶紧逃离那谎言的囹圄。(赵译本第403页)

译3：一阵炸雷响起，像一声枪响，警告他不要逃离谬误的监狱。接下来，一片漆黑。(李译本第242页)

这里联用象征、隐喻和拟人修辞手法，显示出模糊和多义的小说魅力。然而例2与例3将炸雷指涉的含义分别简单化并框定在“催促他赶紧逃离”与“警告他不要逃离”的对立立场之上，抹除了原作象征意象丰富的阐释可能性。解构翻译的“质”的原则要求以最恰当和最相关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移译原文恰当的含义，“即使这是一个意象、隐喻、转喻、不当搭配，或不确定的用词失范”。^⑩结合上下语境，耐心

倾听并接受雷声所蕴含的笼罩在拉祖莫夫周围不可知的绝对力量，它掌控着他的命运，也警示某种不祥和审判。对于这种不可知的绝对力量，拉祖莫夫和叙事者都只能敬畏，而未能揣摩其意图，因此最大可能移译恰当含义的只能是“鸣枪示警”(fired for a warning)，而非将译义固着于“催促他赶紧逃离”或“警告他不要逃离”之偏狭一端。

三、破折号与主体的缺席

破折号，典型地体现了康拉德写作中令人感到棘手的句法上的所指缺失，^⑪一方面，康拉德知道事物表面和底层之间的巨大差异，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定位在“讲故事”的位置上而拒绝探入深处，“我想将现实看作粗糙的未经加工的东西，通过它我可以让自己的手指自由地游戏。除此之外别无其他。”^⑫这几乎就是对德里达的“替补”思想的诠释，即能指的游戏，经由“手指”的指意过程本身，使得原文与译文的字面肌体之间建立亲缘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并非译者全然主动的主体行为，而毋宁是原文生命持存的需要，“原文立足于自身并且转换自身……在扩展自身的过程中完成自身”，^⑬并且这种转换的发生恰恰需要译者的某种缺席。亦如原作者的缺席给予了作品生命和讯息自身的独立性，译者同样应当放弃作者意图揣测和自身偏见的强加，而以主体的缺席和先入之见的放弃为翻译事件的发生让出通道，避免自身意识的框定和信念选择的确定使“不可译性”被封闭和固化在译文中，扼杀了向未来打开以及文本生命再接续的可能性。

在对待破折号的不同策略上，我们亦可发现译者主体性的干预程度之差异。相对而言，保留了破折号及其文体功能的翻译策略，恰恰最少主体偏见和主观信念的加入，尊重和维系原文中向未来敞开的剩余与悖论之下的秘密。比如在下面这个复杂的心理波动瞬间：

It was what that miserable phantom stood for

which had to be got out of the way……“If one only could go and spit it all out at some of them—and take the consequences.”(P302)

译1:那个卑鄙的幻影代表的东西才是不得不要避开的……“要是能去跟他们某个人痛痛快快地讲出来——承担后果就好了。”(许译本第310页)

译2:不能再让那个冤鬼阻碍自己……“如果有人想去爆料就让他去好了——不过要小心后果。”(赵译本第337页)

译3:但那没有任何用。现在必须赶走的,是那个可怜的幽灵象征的东西……“只要向他们中某个人吐露一切,就要承担后果。”(李译本第205页)

译3将这个句子理解为一个充分条件关系的判断,去掉了破折号所连接的前后两个矛盾项共存的中间性(in-betweenness):“痛快释放”与“不幸后果”之间,也去掉了虚拟语气所暗含的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从而将人物微妙复杂的情感状态简单化。译2虽然保留了破折号,却因其过快地将语义确定下来而出现三个明显错译:错误理解动词短语“stand for”;将破折号的非常规用法处理成常规的“意思转折”;抹去了虚拟语气。“if only”引导的虚拟语气将读者带入拉祖莫夫复杂的思虑和痛苦无奈的情绪之中。他痛恨自己所处的境地,因鄙视革命者为了虚假观念而愚蠢献身,痛恨他们的暴力行为,希望能避开“幻影”(哈尔丁)所代表的关于革命的一切。然而他又深知自己深陷“被误解”的沼泽不能自拔——哈尔丁被捕前对他有过溢美之词,而现在他又被政府抄家,监视,因此哈尔丁所在的革命团伙自然会把他纳入自己的阵营。这种误解和错置的身份使得拉祖莫夫痛苦压抑,除非向他们坦诚自己的出卖行为方能消除误解,跟他们划清界限,但由此而来的后果不堪设想。放弃虚拟语气,也关闭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而事实上,拉祖莫夫最后真的向他们忏悔并承担了毁灭性后果。这种敞开,说明拉祖莫夫最后

的忏悔决定并不全然是由哈尔丁小姐引起的,而是一直蛰伏在他灵魂深处。这些就是省略号与破折号所唤醒并要求移译的语言中潜伏的踪迹,啜嚼着未来的“他者”声音,要求译者一方面拒绝过快地将意义安顿下来,反复阅读保持高度警觉,另一方面在声音的耐心倾听之中,在“质”与“量”的计算协商中寻求最佳可能的意义理解和最相等量的字面肌体。^③

再如:

He was a Russian; and for him to be implicated meant simply sinking into the lowest social depths amongst the hopeless and the destitute—the night birds of the city.(P25)

译1:他是俄国人:对他来说,受到牵连也就意味着确实是沉入社会深渊的最底层,与那些无望而赤贫的人——这个城市的夜鸟为伍。(许译本第26页)

译2:他是个俄国人,对他而言受到株连意味着径直跌入社会最底层,变得无可救药,一贫如洗,沦为城市的小偷扒手。(赵译本第25页)

译3:他是俄罗斯人:对他来说,卷入谋杀案,就意味着坠入社会的最底层,与无望的穷苦人为伍,只能在城市里昼夜伏行。(李译本第16页)

破折号引出前面的同位语结构并补充说明“无望而赤贫的人”,“night bird”特指“夜间活动的人”,包括夜间游荡的夜猫子、行窃的夜贼等,内涵丰富多义。如果直接将喻义译出,喻体和破折号都消失,丢失的不仅是喻体与所指相互关联中的文化蕴含,更是这种关联断裂状况下的意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因此这里并非是归化或异化、意译或直译等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基于译者责任的对这两种可能性的计算权衡。一方面,尽可能理解拉祖莫夫的恐惧心理如何建构其内在精神空间——他真正害怕的是他那种贵族血统(身为亲王的私生子)所抗拒和厌弃的

以城市夜鸟为代表的底层人生活,而并非想到自己会沦为一个小偷;另一方面在同样不可译的诗意语言使用中,保存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关联的潜在生命力,忠诚于书写的可重复性,使得在原文和译文主体缺席的全新语境下得以重新铭写入各种可能的习语之中。而对原文做主体的阐释和改写,表面上看彰显了否定原作权威和原作者至上的解构精神,但这种基于意义固化的转化,恰恰是拘泥于揣摩作者意图而对语言生命力的削弱。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You fascinated me—you have freed me from the blindness of anger and hate—the truth shining in you drew the truth out of me. Now I have done it; and as I write here, I am in the depths of anguish, but there is air to breathe at last—air!(P361)

译1:您让我迷恋——您让我从盲目的愤怒和憎恨中解脱出来——您身上闪耀着的那种真实将我身上的真实吸引出来。这会儿我把它掏出来了;此刻我在写作,我感到痛心疾首,可总算是有了空气可以呼吸了——空气!(许译本第366页)

译2:你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免受愤怒与仇恨的蒙蔽——你心中闪耀的真理之光也促使我说出真相。现在我终于说出来了。我在这里写作,内心陷入痛苦的渊藪;但现在终于可以透透气了!(赵译本第401页)

译3:你让我着迷——你将我从盲目的愤怒和仇恨中解放出来——你身上闪耀的真理之光让我说出了真相。现在,我忏悔完了。当我在这里写日记的时候,我置身于痛苦的深渊,但最终有空气呼吸——空气!(李译本第245页)

最后一个破折号拉出了小说的其中一个关键意象——“空气”,它在上下文和整体语篇中前呼后应出现无数次,^③象征拉祖莫夫在憋闷的谎言监牢里所渴望的自由、独立与真实。康拉德作品中“词语和声

音的重复”“往往与主题或结构密切相关”。^③例1中的三个“出来”,将情感层层推进到“有空气可以呼吸”得以释放,感情复杂而热烈,最后经破折重复出一个“—air!”,既是主题的强化,又拓开一个情感的缓冲空间。然而这里最想要说明的是主体性问题:译2和译3服从传统理性和主体逻辑,过快地为“真相”的道出赋予一个主体——“我”;事实上,这里是“真相”与“真相”之间的相互引发。这也是德里达的翻译理论所强调的,对不可译之真相的确认是“非主动(non-active)的行为”^④,是“是”和“是”之间的相互激发,是书写文本内在分裂结构的自主运动和自身转换。^⑤

结语

翻译批评中,分析对待标点符号(尤其是一些非常规用法的具有文体价值的标记性符号)的不同态度,能帮助寻找出译者文本转换中的翻译规则。在解构批评看来,特定语境中的规则是必要的,但只是一种“临时经济”,是译者专名签署下^⑥独自承担的责任和创造性的铭写,它没有总体秩序中好或坏的等级差异。然而是否承认并为原文的“不可译性”预留位置,服从于对不可译性说“是”的承诺使“他者”始终“在到来之中”,是否属于那种其“可复现性”的结构要求内部含有“踪迹”并且向着未来维度开放的“再书写”,在德里达的翻译观念看来,是度量翻译成功与否的根本要素。但正如“书写”“踪迹”等概念是德里达提出的不是概念的概念,“不可译性”作为标准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用来精确划界可明确定义的统一规范,而是在实践中所遭遇到并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或“标准”。

注释:

① Joseph Conrad, *Under Western Ey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本文引用该书均在译文后备注页码,不再一一加注。

② Frederick R. Karl & Laurence Davis(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Vol. I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

③ Jil Larson, *Ethics and Narrative in the English Novel 188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5. 另参 Peters 对康拉德批评接受史的梳理: John G. Peters, *Joseph Conrad's Critical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88. 本文所引外文文献, 中文引文除注明外均为本文作者所译。

④ Michael Greaney, *Conrad, Language,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5.

⑤ 参见宁一中:《康拉德学术史研究》,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128 页。

⑥ [英] 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 许志强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297 页。

⑦ 法文 la grammatologie, 汪堂家在《论文字学》(1999) 中译为“文字学”, 李勇毅在牛津通识读本《德里达》(2019) 中沿用王治河《后现代主义辞典》(2004) 中的译法“书写学”, 认为“文字学”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小学”, 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德里达关注的内容是语言学的子领域, 而“书写学”突出的核心问题则是语音与书写的关系, 且词根 gram 在古希腊语中也是“书写”的意思。此外还有“文迹学”(张宁, 2000; 张一兵, 2008), “文字书写学”(蔡铮云, 2012), “书写文字学”(胡继华, 2015), “书写语言学”(涂纪亮, 2018)。笔者认为, 在“不可译—可译”翻译原则下, 留有一个“迹”(trace) 字是必要的, 它有着自我涂抹的效果。斯皮瓦克在“of Grammatology”序言中提到, 文迹学关乎“涂抹的科学”, 其技巧内含在书名之中, 即“关于文迹的逻各斯”(the logos of the grammè), 文迹作为书写记号, 指示“涂抹”的名字(the name of the sign “sous rature”), 见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reface, 1.

⑧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art I, chapter 2.

⑨ 延异(différance)与差异(différence)语音相同, 但作为书写内部包含表示区隔的“a”, 作为一个差异结构(并非源自索绪尔的语言学差异而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的转化, 只是延异不再追问存在而只追问差异), 包含纵向时间层的空

间化延迟(deffer)和横向空间层的时间化差异(differ)两个方向的复杂交叠。就翻译而言, 前者在意义层面, 意味着词语的确切含义总是推迟着向意识或感知当下呈现(因为活生生的感知或意识无法当下在场); 后者在符号层面上, 因意义推延呈现而在间隔中冒险地进行着符号的一再替换的差异游戏。

⑩⑪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ran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reface, lxxxvii, lix.

⑫⑬ Jacques Derrida, “Des Tours de Babel”. F. Graham (trans.). In *The Acts of Religion*, Gil Anidjar(edit). Routledge, 2002, 105, 109.

⑭ Joseph Conrad, *The Nigger of the “Narciss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

⑮ Michael Greaney, *Conrad, Language,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8.

⑯ 事件是不可预见、不可计划、没有方向和目标、向着未来敞开的“不可能的经验”, 因此是先验的、前语言的。参见 [法] 德里达:《德里达中国讲演录》, 杜小真、张宁编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68-69 页。

⑰ [英] 康拉德:《在西方的注视下》, 许志强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65 页。

⑱ Frederick R. Karl & Laurence Davis(ed.),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Vol. 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1.

⑲⑳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1913-1926*.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4, 262.

㉑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1913-1926*.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54. 亦参 Jacques Derrida, “Des Tours de Babel”. F. Graham(trans.). In *The Acts of Religion*, Gil Anidjar(edit). Routledge, 2002, 114.

㉒ 三译本分别为:《在西方的注视下》, 许志强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在西方目光下》, 赵挺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年版;《在西方的目光下》, 李小均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4 年版。以下引用三译本均在译文后备注译本名和页码, 不再一一加注。

⑳⑳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Lawrence Venuti(trans.). *Critical Inquiry*, 2001(2): 174-200, 199, 181.

㉑这里的不可实现的“再-现”指一种与真实经验相即(adequate, 或严格意义上的 relevant, 或这里叙事者所说的“复制”)的“再-呈现(present)”。在胡塞尔内时间的原初综合的意义上是可能的,在德里达将内时间拆解之后的“延异”结构中则不可能,而拆解就如同将胡塞尔内时间意识中的“原印象”消解在无穷滞留的破折号之中,让被遮蔽的距离、缺席和不在场得以敞显。

㉒“形而上质”是英伽登提出来的判断作品是否伟大的品质,是一种弥漫在作品中的精神性氛围(诸如悲剧性、崇高、神圣、神秘、恐怖等),其光芒可以穿透照亮整个作品。参见苏宏斌:《现象学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6页。

㉓“Alphonse Daudet”, in *Note on Life and Letters*(London, 1921, 28). 转引自《康拉德研究文集》,宁一中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3页。

㉔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Lawrence Venuti(trans.). *Critical Inquiry*, 2001(2)174-200, 179.

㉕参见《康拉德研究文集》,宁一中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54页。

㉖ Louis Lenormand, "Note sur un Sejour de Conrad en Corse", in *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 XXIII, (December, 1924, 669.)转引自《康拉德研究文集》,宁一中编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㉗ Jacques Derrida, "Des Tours de Babel". F. Graham(trans.). In *The Acts of Religion*, Gil Anidjar(edit). Routledge, 2002, 121.

㉘参见 Jacques Derrida, "What Is a 'Relevant' Translation?". Lawrence Venuti(trans.). *Critical Inquiry*, 2001(2): 174-200, 179.

㉙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空气”贯穿小说前后出现十余次。参见许译本第65、237、277、306、339、362页等。

㉚ John G. Peters, *Joseph Conrad's Critical Recep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69.

㉛ Jacques Derrida, *Memories of Paul de Man*. Cecile Lindsay, J. Culler, etc(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0.

㉜德里达当然不是主张译者的无所作为,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伦理主体,译者背负无尽的债务。

㉝虽然这同时又是一种联署,作者、读者和其他译者的联合签名,一个没有共同性的共同体。

Dash and the Derridean Translation of "the Untranslatable":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Examples of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Tu Xianfeng Cai Wei

Abstract: The Derridean Deconstructionist theory of translation puts emphasis 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text, but its relentless deconstruction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s could lead to a deconstruction of the "translatable/untranslatable" division, according to which the untranslatability is not only a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but also a "nonstandard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the fidelity of translation to the source text. Marks of writing such as the dashes typically demonstrate this untranslatability due to the absence of voice, but in particular contexts "the untranslatable" calls for an "economic" measure on translation. From the ways of dealing with dashes among thre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Conrad's *Under Western Eyes*, we can see diverse treatments of "the secret of writing" and different involvements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In so doing, we could illuminat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ashes and untranslatability, the necessity of fidelity to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text, and the feasibility of Derridean "translation of the untranslatable".

Key words: *Under Western Eyes*; Conrad; Deconstructionist Translation; Untranslatability